字典漫談

兼及對中文字典的兩點期望

①權威性與實用性之間的衝突

字典是所有工具書中，最多人使用的一種。一個人只要會讀、會寫，就不能不擁有一本字典。而識字愈多的人，反而愈離不開字典。這話乍聽之下似乎相當矛盾，可是却不是全無道理的：第一、人的知識有一定的限制，沒有人能認得所有的字；第二、人的記憶會隨着時間而遞減，就是原本認得的字，也會因爲久未使用或溫習而忘却。因此，對一個以讀、寫爲業，或有讀、寫習慣的人而言，選擇合用的字典是一件至爲重要的事情。

說到這裏，我們必須緊記一點：由於字典編輯學上的各種限制，沒有一本字典是十全十美的。一本字典容或有其特有長處，可是，必然也有其獨具的缺失。因此。好字典是絕不嫌多的。

那麼，字典究竟是什麼呢？從字面上看來，字典是一種專門搜集「字」、解釋「字」的書。這樣的一個定義固然不能算錯，可是却失之過簡。要想對字典有一較明確的概念，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從字典的「權威性」與「實用性」著手。

字典的權威性建立在兩個條件上：資料的完備程度與解釋的正確程度。「絕對完備」一直是字典編輯者夢寐以求的境界。不過，由於字典資料的來源極爲龐鉅，因此，要達到絕對完備的地步是不可能的。至於解釋的正確程度，則因爲方法學上的限制，也無法達到絕對完美的地步。從這個角度看來，字典的「權威性」本質上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

字典編輯者如果把重點擺在「權威性」上，則他所編出來的字典必然十分龐大。一部原達數萬頁的字典不僅不易携帶，翻查起來也很耗時。因此，「實用性」遂成爲字典編輯者戮力達成的另一目標。所謂的「實用性」主要是指「方便携帶」及「方便翻查」而言。要想作到這兩點，就得在資料及解釋兩方面作適當的裁減。而不同的裁減標準則造成不同程度的「實用性」。一般說來，實用性高的字典多半都是以單册的型式出現，而裏頭所搜集的也大都是比較常見的一般性用字。

「權威性」固然是字典編輯上的最高指導原則，然而，編輯實務上的第一優先考慮却是「實用性」。兩者之間的關係有如魚與熊掌。不過，我們大致可以歸納這樣的一個結論：對一般人而言，一部能够在「權威性」與「實用性」間取得均衡點的字典便是好字典。

②資料的搜集與整理

現在，讓我們把話題轉向字典的編輯實務方面。字典的編輯實務主要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資料的搜集與整理，第二階段是編輯型式的選定。

資料的搜集是整個字典編輯過程中最艱鉅的一項工作。資料的主要來源有二：一爲古今所有的出版物，一爲當前流行的口語用字。

不管資料是什麼來源，每一項資料都必須先作成卡片。要想編出一部權威性的字典，毅力與熱誠是絕不可少的。名震全球的「牛津英文大字典」在搜集資

料的階段總共作了六百萬張卡片。這是一個何等嚇人的數字，可是，和法國朗西市（Nancy）「國家中心」所主持的「法文辭庫」（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比起來，却如小巫見大巫。該中心利用最先進的電腦技術，製作了兩億五千萬張卡片！

製作卡片費時，整理卡片也不輕鬆。整理卡片的第一個目標是「字形及發音的標準化」；第二個目標是「決定取捨」；第三個目標是「解釋」。

（甲）字形及發音的標準化

「標準化」的工作有其特殊的歷史淵源。且以西方爲例。語言先於文字，而西方文字又多爲拼音文字，因此，同一個字可以有很多拼法。這種情況加上方言的因素，使得「同字異形」、「同字異音」的現象非常嚴重。在英文裏頭，像 smith-smyth, civilization—civilisation, connection—connexion 等便是幾個最常見的例子。所謂「字形的標準化」便是運用「語源學」的方法判別，或規定那一種拼法是「正體」，那一種拼法是「變體」或「訛體」。這項標準化的工作是西方國家早期字典編輯者最主要的任務。就英文而言，從一五三〇年威廉·亭代爾（William Tyndale）的第一本「英——英字彙」起，字典編輯的方向大抵是以教育爲目標。所謂的「教育」，一方面是指宗教界希望每一個受過普通教育的英國人都能看得懂聖經，一方面則是指兒童的識字教育。因此，早期的英文字典多半是宗教界人士和小學教員編出來的。這種「文字統一」的工作對於英國文化的傳遞與發展，具有莫大的貢獻。

由於幾世紀來先驅者的努力，現代字典編輯者在字形及發音標準化方面的工作負擔已經沒有那麼沉重了。他們的工作只要是統一現代口語用字的拼法與發音、處理一些「積非成是」的拼法或發音，以及鑒定一些業已「作廢」的字。

（乙）決定取捨的標準

卡片整理的第二個目標是要決定出一個取捨的標準。我們知道，一部字典不管多麼具有權威性，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字一網打盡。這要分兩點來討論：

第一、字實在太多。就以人名、地名以及化合物的名稱爲例。截至目前爲止，字源學家已經透過考據

學的方法確認了兩百餘萬個人名與地名，而化合物與藥品的名稱也接近此數。要把這些字都搜進一本字典中，實在是一件不可能，同時也是不切實際的事情。

第二、同字異形的例子太多，無法盡收。此外，字典既是文字統一運動的工具，則它代表著一種保守的力量。它選定某特定的寫法爲「正體」，不同於這種型式的寫法爲「變體」或「訛體」。在字典編輯者眼中，變體或訛體是不受鼓勵或甚至是禁忌的。因此，基於字典的這一「功能性的限制」，變體字或訛體字除非是相當常見，否則通常是不會被選上的。

我們可以從上述兩點看出：任何字典在處理資料時，都必須先決定出一套取捨的標準來。取捨標準的決定有一套以統計學爲基礎的科學方法。一位編輯者在著手編輯一本字典時，必須先確定這部字典是要供那一階層的讀者使用。讀者階層確定之後，他便可利用統計的方法，歸納出該階層最可能碰到的字。用這種方法編出來的字典將分爲兩種不同性質的類型：一爲「一般性字典」，一爲「專業字典」（如「地名字典」、「人名字典」、「化學辭典」、「土木工程辭典」等等）。而這兩種類型的字典也都因爲讀者的階層性，而有種種詳簡不一的版本。

（丙）解　釋

當字典編輯者決定出一套取捨標準，並根據這套標準從他所搜集的龐鉅資料中選出合用的一部份之後，他就必須開始進行解釋的工作。解釋的工作也不可能作到十全十美的地步，主要是因爲下列的二項困難：

第一、字典是用「字」來解釋「字」，而在這種不斷循環的關係下，沒有一個字眞正獲得解釋。這是一個無法澈底解決的問題。圖解的方式或可幫助讀者瞭解「桌子」、「椅子」、「菊花」、「鯧魚」、「嘴巴」等字彙，可是，一碰上像「感情」、「誠懇」、「狡猾」之類的字眼，就派不上用場了。在這個情況下，字典編輯者只能假設，有一組最簡單的字因爲是代表著人類最直接的經驗，所以是不需要加以解釋的。而這一組字便是用來解釋整部字典的基本元素。

第二、字義太複雜或太豐富。愈是古老的文字，這個問題愈是嚴重。由於字典的解釋不同於百科全書

，講求簡扼要，所以碰上一言兩語絕對無法解釋清楚的字，如「心性」、「現代化」等，就顯得有「意猶未盡」之感。另一種情況是，一個字本身意義太過紛歧，根本無法盡列。最好的例子莫過於英文裏頭的"earth"。當這個字是用來指「人類所居住的這個行星」時，我們不能說，這個字的唯一定義是「地球」。因爲「球形」的觀念是近代科學興起之後才爲世人所接受的。在這以前，人類對「地球」形狀及位置的看法實在太紛歧了，所以，對這個字的定義也就多得不勝枚舉。在這個情況下，「牛津英文大字典」對"earth"的解釋，只好採分類敍述的方式，而無法逐條臚列。

除了字本身的涵義過於豐富之外，引申意義太多也是造成字典解釋難臻完備的一個主要原因。就以「口」（mouth）字爲例。這個字的引申意義實在太多，凡是像嘴巴形狀的東西幾乎都可稱之爲「口」，如「河口」（the mouth of a river），「洞口」（the mouth of a channel）等等。

③編輯型式的選定

當字典編輯者完成了第一步驟的工作之後，他就必須爲該字典選定一種特定的型式。這裏所謂的「型式」主要是就「字的排列順序」而言。而字的排列順序將會直接影響到該字典的「實用性」。

關於字的排列順序，中文字典所採取的方式大致分爲「部首排列法」、「注音符號排列法」，及「四角號碼排列法」三種。西文字典則清一色按字母順序排列。

上述這些排列方式雖然有其便利之處，可是絕不是最好的方式。現有的排列方式有許多無法發揮字典實用功能之處。玆列舉幾個例子：

一、讀者在寫作時，無法從採用這些排列方式的字典中找出他不曾見過，但合乎他需要的字彙。他甚至無法找出所有含義相近的字來作比較選擇。關於這一點，英文字典的解決方式是在某一個字的解釋之後臚列出該字的同義字或反義字。英文字典中更有專門性的同義字、反義字字典。成績雖然不盡理想，可是

終究比中文字典完全忽視這項缺點要强得多。

二、讀者無法根據一種特定的分類方式去找到他所需要的字。譬如說：要想從中文或英文字典中找一種花的名稱、一種雞的名稱，或一種民族的名稱是很不容易的。因爲，一般字典都不會把各種雞的名稱都排列在「雞」字下面。「來亨雞」（leghorn）在中文字典中要查「來」字，在英文字典中則須翻L部。

三、有些同源字因爲經過詞性變化之後，無法併列，造成查閱上的困擾。這是西文字典特有的缺陷。茲以英文動詞 "absolve" 爲例。這個字的名詞是 "absolution"。這兩個字是同源的，本來應當是要併列的，可是却被 "absolutism"（絕對論……）"absolutist"（絕對論者……）所隔開。有些字典爲了要避免這種困擾，遂只列動詞，而將其他的詞性附在底下。

傳統的排列順序雖有上述這些限制，可是，由於那些排列方式都已沿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一般人也都已經習慣於那些方式，因此，除非有眞正完善的新方式出現，否則那些舊方式是不太可能一下子就被取代的。

④關於中文字典的幾點意見

簡單談完字典的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後，我要提出個人對中文字典的兩點期望，作爲本文的結論。

㈠期待一部「國家字典」（national dictionary）。所謂的「國家字典」並不是指政府斥資編纂的字典，而是指一部最足以表達一個國家語文發展軌迹的權威之作。

英語世界的「國家字典」當然是「牛津英文大字典」。拉丁語系的國家也都各有其高度權威性的字典。德國則有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的大字典。北歐、荷蘭、日本、蘇聯等國也都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部「國家字典」的誕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相當龐大的資金。「牛津英文大字典」的編纂工作始於一八七九年，直到一九二八年才全部出齊，耗時半個世紀。「荷蘭文大字典」（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始於一八八二年，直到九十年後的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才「接近竣工的邊緣」。

「瑞典語字典」(Ordbok öfver svenska språket)也是始於一八八二年，到一九六五年才「接近S」。格林兄弟的「德文大字典」始於一八三八年，一八五二年第一部份付印，其餘部份却直等到一個多世紀之後（一九六〇年）才告完成。

中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這樣的一種文字，絕不是區區「辭海」所能代表的。同時，中文「國家字典」的編纂工作也不當由日本人越俎代庖。不過，目前國內也確實沒有一家出版社有足够的財力來進行這樣的計劃。因此，要進行這項工作，主要還得仰賴熱心人士自動自發的獻身與捐輸。

㈡中文字典的編輯方法應求新、求變。坊間常見的中文字典大多是根據舊作拼湊而成，或乾脆原本照登，眞正的新編極爲罕見。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字典固然不是什麼創造性的文化，可是却是滋養文化的肥料。在落伍的字典充斥於肆的環境下，「科學中文化」的口號終將成爲「曠野中的呼聲」。中文字典的編輯方法確實已經到了亟須求新、求變的時刻了

讓我們先從求新的角度來看。現在最常見的中文字裏頭有很多都是從外語翻譯過來的，因此，在新資料的搜集與解釋上，外文字典的內容與編輯技術均可以提供很好參考。這是一條非常實際可行的捷徑。我們必須牢記一點：只要有人肯先動手做，這個社會便自然而然地往前邁進了一步。

其次，讓我們來檢討一下求變的必要性。目前坊間常見的中文字典，在編輯上都侷限於特定的三種型式。這種重疊是一種嚴重的浪費。我們已經從前文的討論中看出那三種編輯型式在「實用性」方面，有相同的限制。我們目前迫切需要的是能够克服那些限制的新型字典，因爲它們能彌補傳統字典的不足。好字典固然不嫌多，可是這個「多」字所指的却主要是「多樣性」，而非「數量多」。

在我們這樣一個變遷日亟的社會中，要想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上求得穩定而健全的發展，就得建立鞏固的基礎。而編出幾本合乎時代需要的好字典，正是衆多「固基」工作裏頭的一項。編出好的字典固然不會有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可是，鑒於幾個世紀以來字典對西方先進國家所作的貢獻，我們確實有必要及早把我們部份的注意力投資在這項「遠期效益的建設」上！